

The Mentality of Conversion

—Literary Master Louis Cha's Psychobiographical Analysis

Xinlu Wang, Zhaoxu Li*, Yarong Ko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Email: 1607139075@qq.com, *sdqfsun@163.com

Received: May 6th, 2016; accepted: May 27th, 2016; published: May 30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tudy of "Ji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But many researchers preferred to explore the literary value of Louis Cha's novels, rather than to give a deep exploration to the life experience of the literary master. This research mainly used a method of psychobiography from religious perspective to explore Louis Cha's mentality of religious conversion. Then we learned that after the sudden committed suicide of 19-year-old eldest son who named Zha Chuan-xia, Louis Cha became rather grieving of the question that what is "life and death of human". With the desire of "immortal soul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t doctrine, Louis Cha, who once read Christian scriptures intensively, chose to convert to Buddhism. And then he successfully got out of the shadow of his son's death, even got away from the pain.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proselytism and reintegration of convert from the definition in psychology of religion. From another aspect, it reflects the cure significance of religious mentality.

Keywords

Louis Cha, Conversion, Proselytism, Reintegration, Psychobiography

皈依的心路

—文学大师金庸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王新路, 李朝旭*, 孔亚荣

*通讯作者。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山东 曲阜
Email: 1607139075@qq.com, sdqfsun@163.com

收稿日期: 2016年5月6日; 录用日期: 2016年5月27日; 发布日期: 2016年5月30日

摘要

近年来,“金学”研究迅猛发展,但研究者多偏爱探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鲜有对金庸本人人生经历的深入探索。本研究采用心理传记学的方法,从宗教信仰的视角,探求金庸先生宗教皈依的心路历程。研究得出:19岁长子传侠突然自杀后,金庸陷入“人之生死”疑问的痛苦。而对“亡灵不灭”的渴望及对佛教教义的领悟,使原本精读基督教经书的金庸最终选择皈依佛教,并成功走出丧子阴影,脱离痛苦。这符合宗教心理学所定义的改宗及皈依的重新整合统一,也折射了宗教的心理治愈意义。

关键词

金庸, 皈依, 改宗, 重新整合统一, 心理传记学

1. 引言

近年来,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金庸热”,作为一代文学大师,金庸先后获得“英国‘OBE’勋章”、“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大紫荆勋章”以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审定以其名字命名的小行星“金庸星”,同时也是小说家、著名学者、企业家、报人、导演、编剧、浙江大学教授和人文学院院长……所谓人红是非多,“金庸热”所带来不仅仅是成功,还有争议。自此,学术界形成了“拥金派”与“拥王(王朔)派”的对立格局。所以,为了更好地认识金庸这位极具争议的文学奇才,更深入地了解其内心世界,面对痛苦他又是如何化解悲伤、走出阴影的,最终又是如何皈依佛教,潜心向佛的……所有的这些,文学大师金庸的传奇一生,都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而近年来,“金学”研究迅猛发展,但研究者多偏爱探讨金庸武侠作品的文学价值,研究其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形式等,鲜有对金庸先生本人人生经历的深入探索。对于金庸先生的宗教信仰层面而言,研究者也是众说纷纭,故本研究采用心理传记学的方法,从宗教心理学的视角,探求金庸先生本人的宗教皈依的心路历程,以期从中感悟文学大师的心理成长、发展与成熟。

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是系统地采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个别人物的生命故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郑剑虹,2014)。作为采用心理学理论来研究非凡人物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分支,其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一般认为,弗洛伊德于1910年出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是第一本心理传记学著作,也可看作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开端(郑剑虹,黄希庭,2013)。而宗教心理学同宗教学和实验心理学一起产生于19世纪末的西方,民国初期正式传入我国。宗教心理学就是通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透视个体在宗教经验中的灵性与宗教性问题。宗教性指的是个人在面对宗教信仰时,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动机态度等,并反映在外界的仪式行为上。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关注宗教信仰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西方心理学界基于佛教理论基础提出了正念疗法,在今天的治疗界被广泛采用。此外,森田疗法、接纳与承诺疗法都是源于中国的佛教与道教(孟瑶,侯萍萍,2014)。

2. 研究程序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金庸¹，原名查良镛，乳名宜生，金庸是他写作武侠小说时使用的笔名，1924年农历二月初六生于海宁袁花镇。海宁查家实属名门望族，素有“袁花镇，查半边”之称。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父亲查枢卿与著名学者茅盾是同学；母亲徐禄是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堂姑妈（查良镛是徐志摩的表弟，1992年12月3日查良镛携夫人回乡向徐志摩墓敬献鲜花，并写下“诗人徐志摩表弟金庸敬题”）。

2.2. 心理传记学分析

运用心理学理论针对查良镛的访谈、自述、会议等自述性材料及其他传记文献等相关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并从宗教信仰的视角，探求查良镛先生宗教皈依的心路历程，了解其内在心理的成长与变化。

3. 讨论与分析

3.1. 生逢乱世，初露才华

以海潮出名的海宁县自古以来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海宁历代藏书家达38家，超过绍兴、嘉兴、海盐等地，仅次于杭州，文风之胜，可见一斑。近代以来，著名的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蒋、徐二人同为查家的亲戚），查家也是人才辈出，自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

而在查良镛先生出生的年代，军阀混战连绵不断，1924年，浙江军阀卢永祥与江苏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垄断鸦片买卖，在离海宁不远的上海附近大打出手，史称“齐卢大战”。9月，孙传芳乘机自福建长驱直入浙江，赶走卢永祥，独霸浙江三年之久。1927年，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江南，南京国民政府在“四一二”政变的血泊中浮起（傅国涌，2013）。

“当年遭寇难，失哺意彷徨。母校如慈母，育我厚抚养。……”（查良镛忆“八一三事变”）

在动荡的乱世，海宁仍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使查良镛得以平静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少年时代。查良镛5岁开始在离家5里多的龙山学堂读书，风雨无阻，从不缺课。15岁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写作才能和经营出版的本领，他的书畅销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大学毕业后，他便以第一名的英语成绩被《大公报》录用，从此他踏入了报业世界，使他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

3.2. 成功路上，悲喜交加

1948年，查良镛被《大公报》派往香港任职，自此，其人生道路彻底改变，创造出一番令人艳羡的辉煌业绩。作品《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相继连载畅销，电影评论家、编剧、导演……样样风生水起，创办《明报》，声震四方，达到人生巅峰。

然而，《老子》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查良镛成功的路上，也充斥着无数的人生之苦，悲喜交加。

1937年，日寇侵入海宁，家乡沦陷，查良镛母亲撒手人寰。少年丧母是人生之痛，是一道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1951年4月26日，他的父亲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在海宁被枪决。丧父之痛、父子之爱，一直埋藏在他的心底；“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查良镛写尽人间悲

¹金庸是查良镛先生写作武侠小说时使用的笔名，是由查良镛的“镛”字一分为二而来。严格说来，本篇文章专门叙述查良镛先生的生平故事，而非单纯谈论其武侠小说，遂后文中一律使用查良镛这个名字为好，特此说明。

欢离合，恩怨情仇，无奈却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经历着两段破裂的婚姻，倍感艰辛；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也成了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

3.3. 痛苦之中，皈依伊始

经历过人生的无数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查良镛的人生就像他的小说一样充满传奇色彩，而有所不同的是，查良镛先生似乎经常挣扎于悲伤痛苦的边缘。在《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中，保罗·蒂里希总结了宗教描述过并为人们体验过的主要几种生存的焦虑：无法避免死亡的忧虑，对生命的无意义和无目的性的恐惧，以及对于我们自身行为后果的关注(何光沪，1990)。于是，“皈依”也就顺理成章的产生了。而对于查良镛先生而言，选择皈依某个宗教无疑是极好的摆脱痛苦的方法，在他的信仰之初，或许是由于年轻气盛，而不能体验到自己所具有的宗教意识，虽已渐渐的信仰宗教，却无法觉察到自己经历了信仰的转折点，以致感受不到宗教信仰的“热诚与安宁”，宗教心理学中称之为“不知不觉的皈依”，也称“无意识的皈依”(unconscious conversion)。有些人在理智上过于悲观或者过于追求实利而见不到“想象中的冥冥世界”。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查良镛在最初的时候是信仰基督教的，而这种信仰是潜移默化的，是查先生自己所没有察觉到的，故在后期访谈等资料中，他不愿承认过自己曾信仰过基督教。

“我不是基督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狄更斯的《圣诞怪异》(A Christmas Carol)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查良镛，2009)

因此，对查良镛先生而言，早期为了摆脱战乱所带来痛苦而寻求的依靠和解决方式，理应是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与依赖。高中时期，查良镛先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圣经》的新旧约全书，反复研读和思考了其中的教义，对之有了深刻的了解和领会，并一度在之后的一言一行，都可从《圣经》中寻到本源，只是查先生自己未能觉察到的。无疑，这种信仰模式是渐进性发展的，它得以进行依赖于四个条件：1) 孩提时期的宗教信仰环境；2) 不受严格信条束缚的相对自由；3) 孩子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转折点上的需要都得到满足；4) 一定量的宗教信仰与自由怀疑共处并存。查良镛先生作为一个先进自由的知识分子，他所接受西方宗教学思想对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的宗教信仰环境自由，对摆脱痛苦与孤独的需要有待满足，在对基督教信仰的同时又对之存在自由怀疑。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查先生早期是信仰基督教的。

3.4. 存疑“人之生死”，渴求“亡灵不灭”

少年丧母，已是人生之剧痛，无法抹平；青年丧父，更是一度将查良镛推向崩溃的边缘。然而，自唐宋以来查氏即是大族，“查祝许董周”是海宁的五个大姓，查姓居首，查家成为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前边笔者也曾提到著名的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同为查家的亲戚，查家也是人才辈出，自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所以，根据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集体潜意识”是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包括祖先在内的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中的遗传痕迹。曾经查氏的辉煌家业与家族集体潜意识中的深远的家世感使得查良镛意识到不得不从丧母、丧父之痛中惊醒过来，并决心重振查家美名，而他也真正做到了，成为一代文学大师。

然而，世事总无常，在经历了丧母、丧父、婚变，尝尽了人生百态，悲欢离合，终于有所释怀时，长子查传侠在美国的自缢身亡对查良镛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令其痛不欲生。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可能会被理解为人生之有命，已是不可挽回，而对于查良镛，这却成了他多年累积的悲痛与压抑最终决堤爆

发的导火索，加之对传侠之爱，更是令这份悲痛之感更甚万分，无法自拔。

“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世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

查良镛又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写到：“……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疼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的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1977年3月，他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离查传侠自杀不过短短五个月，伤口尤新，创痛宛在，所以语含至痛。中年丧子，那是真实人生最深的幸。

“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与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在香港的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金庸，池田大作，1999）

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拼命地用《格林童话》里“伤心母亲想让儿子复活，在神父的引导下觉悟到：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最终得到安慰”的故事来开导自己。此后的一年，他读了无数书，以求解决心中“人之生死”的疑问，详细研究了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最终他意识到，这个“生与死”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而也是在此时，查良镛似乎领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境界。

3.5. 崩溃边缘改宗，重新整合统一

现实中，我们通常把皈依看作是从不信仰宗教转到信仰宗教，或者从一种信仰传统转到另一种信仰传统。但皈依一词也用于另外一种意义：从精神崩溃解体状态到生命的充实统一和有力状态但这种变化是沿着一个人已经接受信仰献身之路进行的。通常情况下，我们称之为一种“重新整合统一”的皈依类型，亦或称之为“改宗”。

“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金庸，池田大作，1999）

在极度的痛苦挣扎下，查良镛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寻找生与死的答案，儿子的自杀便可以理解为他由基督教转而皈依佛教的直接原因，而对于佛教教义的领悟，将处于崩溃边缘的他，重新拉回到现实。

“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宗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译者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法法的纪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小乘’佛经！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念，相信佛陀(印度语文中原文意义为‘觉者’)，的确的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他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金庸，池田大作，1999)

在这里，查良镛先生两次强调“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足见其对佛教教义的领悟与深信不疑，深悟佛教“亡灵不灭”的教义并顺利脱离痛苦，寻得方向。

就个体宗教皈依心理的展开而言，合适的心理环境是不可少的，这就是个人家庭境遇、生活经验、人文环境等因素所造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的破坏。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子，于是伤痛至极，充满了对生死无常的疑惑与悲愤。

笔者认为，查良镛先生改宗的原因是多维的，首先是儿子传侠自杀与美国，而美国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的国家，当时查良镛接到消息后立即去往美国处理儿子的后事，而这是完全按照西方传统的基督教礼仪进行的，但是直到处理完后事回到中国，他发现自己仍然没法走出丧子的阴影，仍然很痛苦，所以，在这里他已经初步意识到按照基督教的方法无法解决他的痛苦；其次，在基督教教义中，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典型的“父性崇拜”的信仰方式，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认为自己是脆弱的、有罪的，是要向自己的“父亲”——上帝，寻求赦免和依靠，希望能在上帝那里得救，灵魂得以进入天堂。而在佛教教义中，其信仰是要人成为“觉悟者”，而大部分佛教徒都是性格里较为强势的人，并希望通过自己的觉悟改变自己的境况，在这里查良镛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性格强势的人，所以他逐渐皈依佛教在他本身而言，也是有理可依的。最后，在佛教教义中，更有“无常”一说，是指不恒常、变化不定，正如《无常经》所载：“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历经如此惨痛的人生变故，佛教的“无常说”便会很容易在其心里滋生蔓延。笔者认为对“无常”的深刻领悟，可以算是查良镛皈依佛教的较为直接的心理动因。正如其1980年在台湾对高信疆夫妇和张大春所言：

“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脱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

1978年，Bear的研究中，研究对象本来是希腊正教徒，但在十几岁时却成了比利·格雷姆型的基督教徒，后来又皈依了基要主义的新教教派，和魔门教派，最后又改宗皈依了分裂出的摩门教会亚伦宗派(Bear, 1978)；1990年，Coe在99个男人中发现了202次宗教觉醒的体验，并得出一个人生活中有多次的皈依过程并不是罕见的(Michael, 陈彪译, 2005)。所以查良镛先生的改宗是情有可原的。

《宗教心理学——一个人生活中的宗教》提出：皈依不一定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有很多精神转折点，而任何一次(或多次)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Meadow & Kahoe, 1990)。显然，对于查良镛先生来讲，他所表现出的改宗，或者说是皈依的重新整合统一，对其解答“人之生死”的疑问，摆脱痛苦挣扎，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决定性意义的。在查良镛先生的生活经历中，少年丧母、成年丧父、婚姻破裂、长子自缢，笔下武侠小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在他身上一幕幕上演，甚至可以说是查良镛自身真实生活的写照。如此沉痛的生活经历，对一个普通人的身心来说无疑是一种接连的精神上的打击，痛苦一再累积，当面对长子传侠的自杀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郁积的痛苦最终转向对精神解脱的渴望，对摆脱痛苦的迫切。于是，查良镛开始尝试从宗教中求得心理压抑的解脱。起初他对基督教的《圣经》有所研读，但依旧无法对痛苦释怀。随后他开始尝试从佛教教义中领悟其中对解脱痛苦的阐释，并从中获得了解脱与安宁。也正是因此，他才能够真正走出丧子的阴影，远离精神崩溃的边缘，并最终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了佛教的教义。无疑，异于常人的痛苦的人生经历，是查良镛人生的

重大精神转折点，同时对于他最终选择从宗教教义中领悟人生、摆脱痛苦，皈依佛教，也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3.6. 参悟佛法，心灵上接近“般若宗”

皈依佛教之后，参透了“生与死”的疑问，从悲痛到释怀，查良镛先生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光。而从那之后，他便开始潜心研读佛法，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佛教徒。

随后，他开始研读大乘佛经中的《维摩诘经》、《般若经》等，又产生了疑问，直到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他终于悟到——原来大乘经典主要是“秒法”。他了解了“秒法”二字之旨，对大乘佛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而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金庸，池田大作，1999）

正如他对杜南的回答一样，他认为，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他信仰佛教，是因为他相信人生就是那样子，所以就信了。

最后，查良镛先生用好些年的时间，将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那几年他大概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些诗歌的编写上。好友倪匡对其小心书写、校对过的每一沓厚厚的原稿，却一直未见公开出版，百思而不得其解。所以其他人对此原因也不得而知。查良镛先生坦言，其年幼时便听过祖母诵念《波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然而，他对佛教的信仰并没有超越尘世的网罗，他并未放下财产、名利，所以，达到佛教所谓的“出世”自然是不可能的。他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灵上与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心理传记学研究方法，从宗教信仰的视角分析得出：作为一代文学大师，查良镛先生经历了大时代的烽火硝烟，饱尝了人之生离死别的痛苦，母亲死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寇入侵，父亲死于 50 年代镇压反革命大潮，香港成为他最后安身立命的地方。所谓“祸不单行”，他又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对于生与死、和平与战争，他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亲身体会，无尽的痛苦与绝望郁结于心。而最令其精神奔溃，乃至绝望到想放弃生命的是一一 19 岁长子查传侠在美国突然自缢身亡，使得其陷入“人之生死”疑问的痛苦。而在最终出于对“亡灵不灭”的渴望及对佛教教义的领悟，使原本精读基督教《圣经》，在无意识状态下皈依基督教的查良镛先生经过“改宗”及“皈依的重新整合统一”，最终选择皈依佛教，研读佛教经书、参悟佛法，并成功走出丧子阴影，脱离痛苦，远离精神崩溃的边缘，并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了佛教的教义。这其实也折射出了宗教信仰极强的心理治愈意义。漫长皈依的心路历程，使得查良镛先生一步步走向沉稳与坚定，如今再看他，虽是年过 90，双鬓斑白，却已然释怀过往，笑谈人生，安享晚年。查良镛先生人生如何坎坷、事业如何辉煌、信仰如何坚定，常人可能无法真正体会，更不必评头论足，正如傅国涌先生所言：“滚滚红尘，转眼成空，是耶非耶，天下后世，自有公论。”

5. 结束语

通过探求查良镛先生宗教皈依的心路历程，笔者对宗教信仰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心理治愈意义产生

了极为强烈的崇敬之感。且不论是哪一种宗教派别更能够给遭受苦难的人带来希望，摆脱痛苦，笔者认为，每一种宗教派别都有其存在的独有的价值，只是我们每个人的领悟能力不同，精神追求不一，所以才导致产生不同的宗教信仰罢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人生活压力巨大，心理科学蓬勃崛起，宗教信仰与宗教心理必然是当今社会平衡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戈登·奥尔波特所言：“……偏见情结、宗教情感、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和个人的人生哲学，都是应予探索的个人生活中的重要领域。”延续心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正视二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所扮演积极的角色，有助于促进社会和国家的和谐，从而有助于人类文明发展。

致 谢

感谢美国富勒心理研究院的项目基金支持，以及对本研究开展的鼓励。感谢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民间文化心理学研究组的老师和同学，正是由于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疑惑，直至本文的顺利完成。谢谢大家！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美国富勒心理研究院试点研究计划项目(PS04LZX)。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陈彪(译)(2005). *宗教心理学导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Michael, A.).
- 陈麟书(译)(1990). *宗教心理学——个人生活中的宗教*.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 (Meadow, M. J., & Kahoe, R. D., 1984).
- 傅国涌(2013). *金庸传*.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 何光沪(1990). “爱这一个错”——读蒂里希《存在的勇气》. *读书*, 6, 34-39.
- 金庸, 池田大作(1999).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孟瑶, 侯萍萍(2014). 宗教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 *文化论坛*, 10, 329-330.
- 查良镛(2009). 圣诞节杂感. *语文世界: 中学生之窗*, 12, 11-11.
- 郑剑虹(2014). 中国大陆的心理传记学研究及其质量结合模式. 载于郑剑虹, 李文玫, 丁兴祥(主编), *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第1辑)*. 台湾桃园: 龙华科技大学.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郑剑虹, 黄希庭(2013). 国际心理传记学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 36(6), 1941-1947.